

回族查拳的历史叙事与近代践习研究

戴洁茹¹, 杜树海²

(1.厦门大学 社会与人类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2.厦门大学 人文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 查拳在历史上具有回族文化特征, 是中华民族武术瑰宝。在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中, 查拳通过谱系学叙事、军国民运动成为塑造族群身份认同和改造国民身体的方式和手段。以符号人类学和历史人类学视角, 结合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 对查拳谱系学叙事及查拳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作用进行考察, 并以民国时期广州回族习练查拳为例, 指出作为集体记忆和身体技艺的查拳不仅是族群凝聚的手段与方式, 其社会化传播也有助于近代中国的国家建构和国民身体改造, 激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代中国“国民”“族群”“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过程呈现同时展开、互动互惠的三位一体模式。

关键词: 民族传统体育; 查拳; 创拳叙事; 回族; 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G85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20)06-0027-07

Historical narration and modern practice of Chaquan from the Hui nationality

DAI Jie-ru¹, DU Shu-hai²

(1.School of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2.College of Humaniti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Chaquan has th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Hui nationality and is the treasure of Chinese Wushu.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Chinese country and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haquan has become the way and means of shaping ethnic identity and transforming the national body through genealogical narration and Military Country Education though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mbolic and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combined with literature and field surveys,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narration of Chaquan genealogy and its spread and role in modern China, and takes the practice of Chaquan of the Hui nationality in Guangzhou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s an example, as well as pointing out that Chaquan, as a collective memory and bodily skill, is not only a way of ethnic cohesion, but also its social communication is helpful to the national construction and national physical transformation in modern China and stimulates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nation", "ethnic group" and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in modern China presents a trinity mode of simultaneous development, mutual interaction and benefit.

Key words: traditional national sports; chaquan; the invention of Chaquan and narration; the Hui nationality;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武术是中华民族在探索身体与自然、社会的关系中, 经长久实践、积累、提炼和总结而成的技击与健身技术, 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上, 回族尚武性勇, 武术是回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与各族长期交往交流中, 回族形成、发

展和传播了很多带有族群文化标记的拳术。查拳就是在回族民众中流传广泛, 经久不衰的著名拳术, 保存丰富的族群历史文化信息。

作为中国传统武术的查拳, 不仅讲求身体技艺的实践(“修身”或“外练筋骨皮”), 更讲求通过身体

收稿日期: 2020-06-12

基金项目: 厦门大学南强青年拔尖人才支持项目“环南中国海区域诸问题的历史人类学研究”(x230330)。

作者简介: 戴洁茹(1987-), 女,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岭南历史文化。E-mail: daijieru2006@163.com 通信作者: 杜树海

实践而达到精神超越与升华(“修心”或“内练一口气”)。“内外合一、形神兼备”成为包括查拳在内的中国传统武术文化的认知结构与叙事类型。对于身体与其所存在、创造和依附的社会文化空间之关联,法国社会学家福柯^[1]曾就隐蔽在现代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各种技术手段与微观权力对身体所进行的规训,进行了细致而深入的论述。美国人类学家格尔茨^[2]则通过“深描”日常生活中的“挤眼”等身体行为、巴厘岛民斗鸡游戏等竞技活动,对其所依存的文化意义结构进行了符号人类学分析。他进而指出,某一区域社会的“地方性知识”体系具有一套独特的“文化语法”,即由语言、宗教、仪式、民俗、律法、艺术等象征符号所构成的“文化形式”以及各种具体的生活实践中的“文化文本”^[3]。本研究试图从符号人类学和历史人类学视角,考察作为具体“文化文本”的查拳在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历史文化语境中与其他“文化文本”的互文阐释关系,以及其在近代民族国家构建、族群认同塑造和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

1 查拳谱系学叙事范式的转换

不论是在民间口头流传的故事中,还是在有史可查的文献记录中,查拳的起源和传播都与回族关系颇深。早期习练查拳有所建树的武术家多为回族,故查拳又有“教门拳”之称。包含于查拳拳术体系内的“十路弹腿”又被称为“教门弹腿”,有“从南京到北京,弹腿出在教门中”的民谚。虽然早期查拳具有明显的族群性,但其形成与发展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智慧与实践的结晶。^①徐哲东^[4]认为查拳拳意与明代戚继光《纪效新书》所著录“温家七十二行拳”颇合,弹腿则与同样盛行于山东的“李半天之腿”有渊源关系。张文广^[5]认为查拳(包括滑拳、弹腿、炮拳等技击术)与戚继光《纪效新书》、唐顺之《武编》等军事著作所记载和总结的武术技法和操练程式具有较强的渊源关系。查拳是由历代回族武术家在广泛吸收和采用中国古代军事搏击及传统技击的基础上,融入回族文化元素,进行归纳总结、改造提升,进而形成中华民族武术瑰宝。

从目前所搜集到有关查拳起源和传播的各种口头和文献材料看,主要有唐代中期传武论、明代中期传武论和清代前期创拳论等流传较广的谱系学叙事。针对各种叙事的“真伪”问题,过去从事武术史研究和体育人类学研究的学者们分别从中国武术史、明清军事史、地方史和拳术传艺谱牒诸角度进行细致的辨析、考证和推测。现今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查拳起源于明末清初的华北地区(即以冠县为核心的鲁西、冀

南、豫北三省交界地带)。在查拳创立和形成初期,习练者具有鲜明的族群性标志,多以回族为主,包括职业军官、获得武举功名的地方精英、宗教人士、民间拳师和普通民众等。查拳早期主要以家族传承、拜师学艺等方式为传承途径,以血缘关系或拟制血缘关系为传承纽带,因此衍生出“张氏”“杨氏”和“李氏”等查拳派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查拳具有的搏击实战特点,亦不排除其作为回族准备武举考试的日常训练与锻炼方式^[6]。

在对查拳各种谱系学叙事进行“纵向”的史学与谱牒学比对研究后,是否那些已被“证伪”的叙事便不再具有史学和文化人类学价值?本研究试图将各种查拳谱系学叙事视为族群“集体记忆”,将查拳谱系学叙事“文本”放置于19和20世纪回族所处的社会背景当中,对其进行“横向”的结构主义分析与符号人类学阐释,进而反思回族族群性以及近代民族国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构。

1.1 唐代中期传武论

唐代中期传武论来源于近代回族查拳拳师的口述与整理。据张文广^{[7]764}记录,回族查拳名家张其为曾于1932年口述查拳历史,后由张子英转述。该口述史称,唐代“安史之乱”时,唐王朝为平定叛军,曾向回纥国搬请三千精兵。回纥军士滑宗岐在行军途中因病滞留山东冠县,因感念当地民众悉心照料,便于病愈后在当地传武,并招师弟查元义前来一同传艺,遂形成滑拳(滑宗岐所传“架子拳”)和查拳(查元义所传“身法势拳”),统称为“查拳”。^②从目前主流武术史研究成果看,唐代中期传武论难以成立。但历代回族拳师口耳相传的谱系学叙事,却与回族在特定历史时期的“集体记忆”范式形成互文。早在明清时期,有关唐代伊斯兰教贤者和兵士进入中国的传说,已在汉族和回族知识精英中流传开来,并成为回族关于自身来源的“集体记忆”范式。^③明代何乔远^[8]《闽书》便有记载:“默德那国有吗喊叭德圣人……门徒有大贤四人。唐武德中来朝,遂传教中国”。清代著作中亦记载:“唐太宗夜梦缠头于宫门内追逐妖怪,召群臣问之。圆梦官答复,缠头乃是西域回回,并言嘉峪关西的回王道高德厚,国富兵强。如得回回,可消灭宫中妖气。唐太宗便遣使至回王处,得其国中三贤来华报聘。不幸三贤中的二位均因水土不服归真,仅余‘噶心’一人来到中国。临朝诏对时,‘噶心’以西域天降之经比之中国五经,唐太宗听闻大悦,选三千唐兵前往西域换三千回兵来到中国,遂为中国回教徒之祖先”^[9]。迄至民国时期,广州回族创办刊物《天方学理月刊》亦有关于伊斯兰教入华故事:“昔唐王求贤于西域,穆圣

遣‘幹个士’爸爸来华,并携教徒三千,答唐王聘及任传道焉”^[10]。由此可见,自明代中后期始,唐代伊斯兰教入华之事已深深嵌入回族祖源叙事当中,成为回族各文化事项的社会背景。查拳唐代中期传武论显然受到该叙事范式的影响。将查拳唐代中期传武论的叙事文本与伊斯兰教入华的传说文本进行对比,可见两者在叙事结构和隐喻象征上具有极高相似性:两者均是强调由“外”入“内”(从回纥来到中国或从西域来到中国);帮助中国恢复秩序(助唐天子平叛或助唐天子祛邪);礼物的交换(唐天子以三千唐兵交换三千回兵或滑宗岐、查元义感恩百姓救助而传武);扎根中国(成为中国回教徒祖先或创立中国武术拳法派别)等。

1.2 明代中期传武论

明代中期传武论叙事结构与唐代中期传武论相似,是明清时期回族“集体记忆”范式的验证性叙事。明代传武叙事大意为:明代中后期,中国东南沿海屡遭“倭寇”侵扰。朝廷任命戚继光为大将,征召各地义勇前往助剿。有新疆回民名查尚义(或称查密尔,密尔为波斯语,意为长官)慷慨应征,但在途经山东冠县张尹庄时病倒,为当地民众所救助。查尚义感念当地百姓恩德,便招结拜兄弟滑宗岐前来,一道在当地传授武艺^[1756]。对于查拳明代中期传武论的真实性,张文广等曾撰文质疑,本文不再赘言。对比唐、明传武叙事可见,明代中期传武叙事在文本结构上与唐代中期传武论大体相似。其所异者,一是传武主人公从滑宗岐转为查尚义,这与武术界通行的“查拳”名称保持一致,使该叙事文本更易于记忆与传播;二是传武主人公从回纥军士转变为新疆回民,实现了族群身份的转换。将唐代中期传武叙事中,“自外(异域)向内(中华)”转换为中原王朝内部的“自西(新疆)向东(中原)”,更凸显查拳的本土性和族群性。此外,由于查拳拳势特点多与戚继光著《纪效新书·拳经捷要》记载拳势图、拳诀相似,因此明代中期传武叙事也更加符合中国武术发展的阶段特点。总之,明代中期传武叙事虽在叙事范式上与唐代中期传武叙事保持高度相似性,但在身份认同层面,则更加符合回族所处社会文化环境的宏大历史叙事与实践感知。

1.3 清代前期创拳论

张文广提出“清代前期创拳论”是对传统查拳传武论的范式革命,也提示近代以来回族“集体记忆”范式已悄然发生转变。1984年,张文广对各种查拳传说进行考证与梳理,并对冠县查拳进行田野调查后提出:查拳可能为清代祖籍冠县沙庄的回族武进士沙亮所创,所谓“查密尔”乃是“沙密尔”的一音之转^[5]。据《沙氏族谱》记载,沙氏于明末自冠县沙庄迁至阳

谷县张秋镇。清代,沙氏一门多出将种,沙亮生于清代康熙年间,于雍正年间连中武举人与武进士,曾在浙江、广东和山西等省充任军职,后战歿于金川。张文广“清代前期创拳论”的提出,使得查拳创始者由传说中面目模糊的西域穆斯林军士,成为在正史中清晰可辨的中原回族武将。由“外”转“内”的族群“集体记忆”新范式也成为了后续相关研究与论述的方法与指南。综合目前研究可知,沙亮应为清代前期查拳拳门中有较高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的职业军官,其所习练查拳或来自家学渊源,或来自当地回族拳师为准备武科考试的训练与锻炼技法。若搁置沙亮查拳门“开山始祖”抑或“第二代掌门人”的争论,转而考察新范式中各叙事文本,可发现其在叙事结构、重点人物事迹及其社会文化背景上与旧范式相比有了巨大变化。一是,查拳不再是来自回纥兵士或西域穆斯林的传授,而是由世代居住于中原王朝腹地华北平原上的回族武人自创、家传或教授。旧范式各叙事的共时性横向联系(内-外、东-西),转变为新范式中的历时性纵向联系(古-今)。二是,查拳创拳者和传承人的身份更加符合中国传统武术史叙事的各种角色类型,既有符合传统道德规范,参加官方武科考试并忠君报国的沙亮、张儒诚等回族精英,也有暗合话本小说情节,藏身于坊间村肆并除恶扬善的李老崇、马老维等回族民间拳师。因此,无论查拳是否由清代前期的沙亮或其他回族拳师所创,新范式文本叙事内容和策略已与中华武术文化的精神合拍。

受民间口头文学流行特点所限,传统查拳传武论虽可确定深受明清时期回族“集体记忆”影响,但叙事的兴起时间均难以准确定位。若将查拳谱系学叙事从武术史研究视域中剥离,放置于中国社会思潮的发展脉络中考察;由历史学角度对查拳进行的历时性考证,转向对谱系学叙事范式进行共时性结构主义分析发现:自明清以至20世纪,随着回族对族群性和族群文化的反思和认识不断深入,查拳的谱系学叙事范式从早期“自外(异域)向内(中华)”“自西(西域)向东(中原)”的小传统,转向更为符合中华文化大传统的新“集体记忆”,即查拳乃中原回族拳术“从古(明清)至今(当下)”的创造、继承与发扬。这个过程印证了伊斯兰教中国化的历史方向与回族扎根本土、爱国爱教的发展之路。

2 近代国民身体改造与“国术”查拳

2.1 查拳的族群性与国民性

在查拳形成和发展的早期,其谱系学叙事、教习群体、身体技艺等层面均浸染浓厚的回族文化特征。

明清时期,查拳通过个体在社会文化场域(村落、寺坊与科场)中的连续和反复叙述与教习,不断帮助个体对身体、生命、文化和信仰进行体认,为回族文化的传承和延续提供真实的生命活力。清乾隆帝有“中土回人性多拳勇”之语^[11],正表明查拳是明清时期回族民众形成族群边界和构建身份认同的集体记忆与象征符号,也是嵌入和铭刻于族群身体上的记忆与惯习。

20世纪初期,中国在遭受贫穷、灾荒、内战和强敌入侵等诸多苦难中,尝试从“老大帝国”向“民族国家”艰难转型。在政治层面,革命话语及实践获得不可挑战的正当性。在文化层面,“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使得中国传统儒家强调义理、心性高于肉身、人欲的礼教观念跌落圣坛。与此同时,当时广为流行的将身体、疾病与民族、国民进行类比的歧视话语,如“东方病夫”等,也极大激发了当时的精英阶层。他们在对“国体”“文化”进行抽象思考和宏观改造的同时,也对具体而微的国民身体改造兴趣强烈。在近代中国,“身体的国家化发展”是诸种深刻变化之一。由梁启超、蔡锷、蔡元培等政、学界精英号发起的“军国民运动”对国民身体的国族化归属及标准化发展产生深切影响^[12]。“军国民运动”提倡通过学校、社会、家庭三方面合作,以加强体育训练和教授军事知识为手段,以鼓励自强精神和爱国意识为目的,锻造国民的军人体魄和尚武精神,实现国家自下而上的革新与自强。受此影响,中央和各省教育主管与研究机构将包括“兵操”“体操”“拳法”“刀法”等在内的各式体育活动,确立为初、高等学校教育科目或教育重点^{[12]51-52}。正是在上述社会思潮影响下,查拳的社会功能、象征意涵和文化内容发生巨大变化,成为国民教育和身体改造的重要方式。

民国时期,由于查拳具有简洁明快、易于习练、实用性强的特性,迅速被政治精英、军队要员选中,以“国术”之名在军队、学校和社会推广,成为面向“国民”推广和普及的身体改造技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为面向全体国民推广的“国术”查拳在社会传播过程中还超越早期的性别界限,出现姜爱芝、腾南璇等女性查拳名家以及济南回民女子武术社等社会团体,习练查拳成为新女性在社会上公开展示自身和力量的一种手段。

2.2 中华新武术与“国术”查拳的推广

1914年时任陆军第四十七旅旅长兼济南卫戍司令官的马良(回族)便广邀武术名家,举办军士武术传习所。^④山东冠县查拳名师张其维曾应马良邀请,前来济南展示查拳技艺,其弟子张英振与冠县查拳名家杨鸿修则受聘为武术教练,帮助马良改良传统武术,

推广适宜指挥和操演的“中华新武术”。在马良等回族武术家的合力推动下,包括查拳在内的传统武术日趋规范化并进入军队和校园,受到社会大众的追捧。在济南,经杨鸿修指导和教授的弟子包括王兆亭、王兆林、于振声、马金镖、米广亭、王子平等武术名家。这些名家在济南将查拳和当地传统摔跤技法结合并发扬光大,培养出马裕甫、杨法武、杨松山、周子和等武术翘楚。至此,原本流行于以冠县为核心的鲁西、冀南、豫北三省交界地区回族中的查拳在济南站稳脚跟,随后在青州、泰安、临清等地以及青岛等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城市中受到追捧并广为传播。

1919年著名武术家吴志青创立“上海中华武术会”。由于吴志青早年曾师从于南下传艺的济南回族查拳名家于振声,其在创会后便通过于振声邀请马良和杨奉真、王子平、马金镖、王占坤、王凤章、何世昌等^[13]查拳名家前来传艺,并编写《教门弹腿》向社会大众进行普及推广。“上海中华武术会”主要教授查拳、滑拳、弹腿、炮拳等技法,会员最多时达千余人,并办有《武术》会刊。同时,该会还在厚德小学、沪北公学、圣堡罗学校、英华学生会、中城商业会等众多学、商界机构传授和表演武术,取得广泛的社会影响^[14]。除“上海中华武术会”外,“上海精武体育会”也有李氏查拳传人李恩聚、李龙彪、李瑞彪等在内教习拳术。

南京“中央国术馆”的创立与一系列全国性武术展演和竞赛的举办,促使查拳从华北地区传播至全国,成为民族国家试图改造国民身体的“国术”技艺。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完成全国形式上的统一。这一年,在李烈钧、张之江、冯玉祥、于右任等国民党耆老的推动下,南京“中央国术馆”成立。南京“中央国术馆”是国民政府最高的武术管理与研究机构,初由冯玉祥任名誉馆长,张之江任馆长,济南回族查拳名家于振声任顾问。“中央国术馆”的创办旨在倡导全体国民发扬尚武精神,以国术“强种救国”^[15]。在首期教授班的必修科目中,“四路查拳”赫然在列。张之江、吴志青编辑出版《国术教范查拳》教材,向社会大众推广“国术”查拳。在南京“中央国术馆”中,查拳、弹腿各科均隶属“少林门”,执掌“少林门”的则是“神力千斤王”之称的著名回族爱国武术家王子平。包括杨松山、何福生、马裕甫等回族查拳名师均曾在南京“中央国术馆”任教或担任职务。南京“中央国术馆”除整理、出版和宣传包括查拳、弹腿等在内的国术技艺,还通过举办规模盛大的“国术国考”以及开设教授班、师范班、练习班、青年班和少年班等方式培堆武术土壤,培养武术师资,培育武术新人。在南京“中央国术馆”的影响下,全国各省、市、县的

“国术馆”纷纷成立,使得查拳名家得以在全国各地交流和传艺,查拳影响遍及河南、甘肃、辽宁、广东、广西等地,亦传播至东南亚各地。

3 广州回族查拳践习过程中族群、国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1 北方回族武术家南来与广州寺坊空间

广州世居回族中多有明代“达官军”以及清代回族军士的后裔,尚武之风浓厚,常有众多热爱武术的回民在清真寺内自行习练^[16]。因此,北方中原地区具有军事操演和实战技巧特点的查拳,刚传入广州便得到本地回族的喜爱。广州回族习练查拳的历史可追溯至20世纪20年代。1929年主政广东的李济深受南京“中央国术馆”以武术“强国强种”号召的影响,在国民革命军北伐誓师地广州东校场创办“两广国术馆”,并聘请南北众多武术名家来此开班授课,其中便包括王少周等回族查拳名家。由于查拳又被称为“教门拳”,在历史上具有明显的族群文化标志,因此受聘来穗传武或交流武学的回族武术名家,往往在本地清真寺参加礼拜,并向本地回族传授查拳技艺。根据广州回族的口述史,王少周是最早教授广州回族习练查拳的武术名家,他授艺的地点位于广州怀圣寺内。在王少周的教导下,广州回族马家林、马家苏、杨汉光、杨孔德等均学有所成^{[17][102]}。民国时期,除王少周教授查拳外,河南回族拳师马锡福、四川回族拳师马仰之等均曾在广州怀圣寺中向回、汉两族群众传授查拳、醉剑、大小洪拳、岳家掌和醉八仙拳等技艺^[18]。除怀圣寺外,据广州查拳教练羽光昊讲述,他曾听广州回族前辈讲述,在20世纪20—30年代初期,曾有一班回族武术爱好者在南胜寺(位于今广州市越秀区大南路)跟随途经广州并做短暂逗留的外地回族拳师习拳,习练拳术以查拳为主,包括滑拳、洪拳、炮拳等。^⑤

广州寺坊的独特地理位置及清真寺作为广州回族重要社会公共空间的场域特性有利于查拳在广州回族流行。民国时期,在“强国强种”“国术救国”的背景下,广州武术馆社得到蓬勃发展。一时间,各武术馆应运而生,主要有广东精武体育会,其地址一度迁至太平南路嘉南堂(今广州市越秀区人民南路)、丰宁路(今广州市越秀区人民中路);两广国术馆,设在东较场马房附近(今广州市越秀区中山三路);广州国术社,馆址设在国民体育会内(今广州市越秀区惠福东路);傅振嵩太极联谊社,位于今广州市越秀区惠福西路温良里。广州世居回族主要聚居的怀圣寺坊、南胜寺坊等均毗邻于上述主要武术社团。在广州回族看来,清真寺是神圣空间的“卡里斯玛”权威与公共空间的传

统权威交汇之处。在寺中跟随周边武术馆社的北方回族拳师习拳,既遵守圣行,又可参与到社会公共生活中来。据原广州回族历史研究会会长保延忠回忆:“怀圣寺的经学生、设在怀圣寺内的清真小学学生及附近的回族青年,也经常跟着(北方回族拳师)学习武术。每天晨早和傍晚,不少穆斯林在怀圣寺做完‘晨礼’和‘昏礼’后,就在礼拜大殿前的‘大滩池(小广场)’练武。”^⑥

这一时期,查拳作为改造国民身体和民族精神的身体技术,借助现代化媒介(报刊、杂志)和组织(政党、军队、学校和社团)进行宣传和推广,从而得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远距离和制度化传播。民国时期的广州回族正是在“强国强种”“国术救国”这样宏大的政治话语和文化背景下才得以习练北方回族拳师的查拳技艺。但广州回族早期践习查拳的途径和方式表明,查拳仍然是依托传统的族胞情谊和寺坊组织进行“在地化”发展。可见,民国时期试图塑造国民的“国术”查拳在社会宏观层面的传播与其在微观层面作为族群认同的象征符号并不矛盾,并行不悖。

3.2 广州回族查拳习练与话语的转变

查拳在广州的传播,早期主要是通过北方回族拳师南下进行教授,以拜师授徒或拳师间交流武技等传统方式完成。传统习练方式的转变以20世纪40年代后期“塔光国术社”的成立为标志。1946年由于寺坊中习练查拳的回民日益增多,为使习拳活动更加有序,也为满足查拳在社会上声势渐隆而产生的各种表演和展示需求,在广州回族杨孔德、保功达、马明等提议下,“塔光社”(后改名为“塔光国术社”)在怀圣寺创立。早年曾跟随王少周、马锡福、马仰之学习查拳的广州回民马家林(字惠泉)担任主教,保功达、保少民和马展鹏任助教。因马家林等教练还曾跟随南拳名师谭三、孔昌等习艺,所以“塔光国术社”在教授查拳套路、十路弹腿、梅花拳、捷拳、功拳外,还教授社员岭南武术中的蔡李佛拳、洪家伏虎拳等^{[17][103]}。除教授和融合中国南北优秀传统武学外,“塔光国术社”也将西方竞技体育项目,如拳击、举重、单杠等纳入日常训练中。从“塔光国术社”武术教练的人员配置和习练项目来看,早期传武教练从北方回族拳师转为广州本土回族拳师,传授拳术也从以“教门拳”为主转变为融合岭南拳法在内的中华武术体系,并学习和纳入西方竞技体育元素。在“塔光国术社”鼎盛时期,社员超过百人,其中90%为回族学员,还吸引居住在塔光路附近的汉族青年李志能(女)、罗新、陶羽等入社习武。这表明广州回族查拳的传播在微观层面也突破族群边界,“教门拳”与“国术”日渐交融。

对于广州回族查拳习练者而言,“国术”话语正式取代传统“教门拳”称呼发生在“塔光社”成立后不久。1946年成立不久的“塔光社”便依照市警察局命令,与全市各武术社团一同加入“广州市国术协会”,经过登记、审查、领取会员证后更名为“塔光国术社”。改名后的“塔光国术社”即派代表参加“广州市国术协会”成立大会并进行了武术展演。此后,“塔光国术社”社员便不再如过去仅以“教胞”“族胞”身份,而是在“国术”的名义下以“国民”身份参与各项社会公共活动。1947年广东遭受严重水灾,因此举办了两场赈济水灾筹款义演大会:广州市国术搏斗大会和中国式拳击比赛大会。其中,广州市国术搏斗大会在十三行足球场举行,大会连赛两天,万人空巷。“塔光国术社”便积极参与义演筹款,社员马德昆、保功达、李志能等为市民奉献了精彩对局,其中,马德昆还获得国术搏斗大会拳术擂台赛的冠军^{[17]141-145}。“塔光国术社”的创立过程和发展历程表明,广州回族从传统寺坊习练查拳到登记注册,并公开开展演国术的实践与近代中国“造国民”的要求日趋一致。

从 20 世纪 20 年代末期开始习拳至 40 年代末期“塔光社”成立,广州回族习练查拳的实践与经历也使得族群认同得到加强。由于广州回族的族源多元,不同历史时期族群内部具有一定异质性,因此,民国时期的广州回族知识精英曾通过强调唐代伊斯兰教由海道入华历史、追忆先贤宛葛素等历史文化事件,确立身份认同和“想象”共同体^[19]。查拳在广州回族中的传播,有助于广州回族通过追溯查拳谱系学叙事和习练查拳的身体实践,将各地回族同胞关联于一套族群文化表征和身体符号中,进一步形塑族群文化传统与身份认同。由于入穗传武的北方回族拳师来自于查拳的不同派别,并且入穗传武的时间也不一致,因此,在广州回族查拳习练者中实际上存在着山东与河南两种查拳种类。但民国时期拳师间口耳相传的查拳谱系学叙事却弥合了其间的差异,查拳谱系学叙事将拳法流派与族群分支进行类比,形成类似于“根本(祖源)一枝叶(派别)”的树形认知结构。例如,广州查拳教练羽光昊就认为:“以前广州回族中存在山东、河南两系查拳种类,但都源自于在山东创拳的查密尔。各地回族习练的查拳因风土习惯导致手法套路虽有差异,但相差不远,其中包含不同的技击含意和用法奥妙”。①查拳源自山东并发展出具有各地特色手法套路的叙事,符合对生活于同一个国家但分处不同地域的共同体想象。在习练查拳和追溯查拳谱系学叙事外,“塔光国术社”还通过组织会员参加“游孤坟”活动,为历史上在广东各地归真的外地族胞进行祈祷。“游孤坟”活动

打破了传统寺坊的社会空间边界,以跨越时空的形式将“古”与“今”“内”与“外”的关联再现于游坟仪式中,对振兴族群身份认同产生积极作用。可以说,有关查拳的习练、讲述与仪式促使民国时期的广州回族将自身与中国各地回族同胞关联起来,形成族群认同的身体记忆。

关于民国时期“民族”和“国家”概念的传播与构建过程,王明珂通过考察民国时期在边疆从事民族考察的学者们的调查和社会活动,指出当时存在着“造民族”和“造国民”两种不同路径的微观过程^[20]。杜树海^[21]通过对抗战时期的广西回族活动的历史人类学分析,认为广西回族的抗战活动既是回族保卫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过程,又是振兴族群认同、提升族群地位的过程,两个过程呈现出双向互动和互惠。上述“国民”“族群”和“中华民族”的构建和塑造过程亦同时体现于民国时期广州回族的叙事和践习当中。抗战时期的广州回族通过习练查拳,标榜“尚武性勇”的族群性格,形塑广州回族参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叙事模式和实践方式。抗日战争时期,广州回族创办的杂志刊登文章称:“汉人筹策,周于帷幄之中;回人声威,著于疆场之外。”^[22]“尚武性勇”的风气同时也激励一批广州回族积极投身抗日斗争,广州回族张自珍、张永强、张永逸、张永富四姐弟在抗战中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积极从事地下工作、抗日游击队工作和东江纵队的武装斗争^[23]。习武与抗战活动不仅振兴广州回族的族群认同,也激发了广州回族的国民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抗战结束后,广州回族查拳习练方式和话语的变革更将这一过程继续推向前进。

民国时期,查拳在广州回民中的传播表明,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国民、族群和中华民族的建构乃是同时展开、互动互惠。作为“国术”的查拳,其文化传播有助于近代中国的国家建构和国民改造。查拳在各地回族中的传播也成为凝聚各地回族同胞的手段与方式,并在特定历史时期激发出回族同胞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国民”“族群”“中华民族共同体”三位一体的复调叙事。

伴随着近代中国的转型,具有回族文化特征的查拳在谱系学叙事上从唐朝、明朝传武范式转向清代创拳范式,并作为“国术”参与到近代中国的国民身体改造计划当中,成为建构国民、族群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方式和手段。从族群小传统向中华民族大传统的演化历程表明,作为中华民族武术瑰宝的查拳具有与时俱进的强大生命力与创造力。2008年查拳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标志着查拳作

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遗产和载体的身份得到确立,其社会功能和文化内涵也随之得到激发和更新。查拳是新时期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身体实践和宝贵文化财富。

感谢广州市回族历史文化研究会汪鲸副研究员在本研究资料收集过程中提供的帮助!

注释:

- ① “弹腿”有创自于五代后周龙潭寺老僧的传说。
- ② 另有查拳传自“安史之乱”来华助唐的“大食”兵一说,当为后人虑及唐代回纥部族并非信仰伊斯兰教,故而改换国别。
- ③ 另有《明史·西域传》《清真释疑补辑》《定州重建礼拜寺记》等明清官方史料、回族知识分子著述和清真寺所藏碑刻记载伊斯兰教入华时间为隋代开皇年间,这些材料虽与历史不合,但亦为回族在特定历史阶段的一种族源叙事。
- ④ 军士武术传习所即著名的“马良技术队”,是中国最早的官办武术专科学校之一。
- ⑤⑥⑦ 根据笔者田野调查和访谈资料整理。

参考文献:

- [1] 米歇尔·福柯. 规训与惩罚[M]. 刘北成, 杨远婴,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18: 153-219.
- [2] 克利福德·格尔茨. 文化的解释[M]. 韩莉,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8: 3-34.
- [3] 张士闪. 灵的皈依与身的证验——河北永年县古城村梅花拳调查[J]. 民俗研究, 2012(2): 55-69.
- [4] 徐哲东. 国技论略[M]. 太原: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3: 26.
- [5] 张文广, 康戈武. 查拳源流初探[J]. 北京体育学院学报, 1984(1): 1-7.
- [6] 马明达. 武学探真[M]. 台北: 逸文武术文化有限公司, 2017: 530.

- [7] 张文广. 中国查拳[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5.
- [8] 何乔远. 闽书(第一册)[M].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4: 165-166.
- [9] 李伟, 吴建伟. 回族文献丛刊(第一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161-180.
- [10] 有宝. 微笑录[J]. 天方学理月刊, 1929(9): 9.
- [11] 魏源. 圣武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4: 313.
- [12] 黄金麟. 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M].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6.
- [13] 昌沧, 周荔裳. 中国武术人名词典[W]. 北京: 人民体育出版社, 1994: 291.
- [14] 陌雅. 上海中华武术会[J]. 体育文史, 1987(6): 51.
- [15] 张之江, 吴志青. 国术教范查拳[M]. 上海: 大东书局, 1932: 16.
- [16] 保功达. 广州回民体育活动的组织——塔光国术社[G]//广州市伊斯兰教协会文史资料研究组. 广州市回族、伊斯兰教文史资料选辑. 2002: 136.
- [17] 马志斌. 岭海武林[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0.
- [18] 曾昭胜. 广东武术史[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9: 85.
- [19] 汪鲸. 族群建构中的想象与实践——以民国时期的广东回族为例[J]. 回族研究, 2013(3): 51-57.
- [20] 王明珂. 民族与国民在边疆: 以历史语言研究所早期民族考察为例的探讨[J]. 西北民族研究, 2019(2): 79-96.
- [21] 杜树海. 族群振兴与国家建设——广西回族抗战活动的历史人类学分析[J]. 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4): 64-69.
- [22] 吴功补. 国难声中所望于穆民同胞者[J]. 穆士林, 1932(8, 9): 3-4.
- [23] 张永逸. 广州回民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点滴记述[G]//广州市伊斯兰教协会文史资料研究组. 广州市回族、伊斯兰教文史资料选辑. 2002: 211.